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 一、研究動機

國際關係環境與理論發展存在密切的互動關係，兩者相互依存而生。國際環境會影響國際思維的發展，帶動新思維的興起與架構成形，同時也弱化某些思維觀；相同的，人們思維的轉變，也將影響國際關係的運作，進而影響國際社會結構的轉形與發展。世界進入後冷戰時代，結束了一個以武力對抗的時期，取而代之的是國家經貿實力的競逐，區域經濟集團的勃興，「歐洲共同體」在 1993 年 11 月通過馬斯垂克條約改名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 EU)，使歐洲整合更向前邁開一大步，歐盟各國從中所取得的利益與優勢，也更進一步催促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經合會的加速整合，而這也正顯示出區域整合型態的新趨勢。

1967 年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 簡稱東協) 成立，代表了東南亞國家對國家安全的認知的轉變，各國紛紛緩和或擱置與鄰國的衝突，將安定國家內部作為首要國家安全目標，這種歷史反省造成的安全思維轉變，是新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的現象。<sup>1</sup> 東協原是一個政、軍、經實力都不強，且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區域組織，其組織原本是以經濟目的為主且缺乏約束力，其在政經議題的影響力更遠不及歐美等大國。冷戰結束後，美、俄勢力相繼退出東南亞，區域進入「權力真空」狀態，使得美、俄以外的國家，如日本、南韓以及中共都急於介入與掌控區域利益，印度也想分一杯羹，這些國家勢力的深入，使得東協各國感受來自各方的壓力；尤其東協傳統上一一直視為威脅的中共，近年來經濟成長快速，且其第三、四代領導人的權力順利完成交接，這也使得中共對外，尤其是鄰邦的戰略關係有了改變，除了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外，也逐漸增加政治、安全層面的對話，企圖利用擴大政治、經貿合作，來增進區域安全；此外，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自上任以來，就積極行動企圖改變世人所謂「中國威脅論」的敵意，從睦鄰政策到和平崛起，一再說明中共此時期的經濟掛帥與戰略機遇期的韜光養晦。上述這些勢力的介入與潛在威脅的衝擊，改變了東協各國的區域安全概念，更促使群體認同意識漸漸抬頭，但東協區域組織原就是以經濟為主且不具約束力，如果繼續堅持這種論調，放任各個會員國以所謂「東協方式」(ASEAN way) 只求各自管好內政，而不與國際社會互動，那東協將無法掌握未來東南亞或東亞整合的脈動，甚至，會因此而在全

---

<sup>1</sup>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1999 年 10 月)，頁 33。

球化區域整合的歷史潮流中缺席，喪失進步的動力與助力。

2003年10月17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第九屆東協元首高峰會，東協領袖通過東協「峇里第二和諧宣言」，以「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經濟共同體」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等三大支柱，期能仿效「歐盟」在2020年前建立成爲「東南亞共同體」；姑且不論東協是趕搭時代潮流列車，或是真正感受區域整合的利益與必要性，東協此舉卻是自1967年成立後，首次確立將朝歐洲整合的模式邁進，將區域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全數納入原本鬆散、無政治軍事意涵的組織架構之下，其所擘劃的區域整合藍圖不可謂不大。其實東協之會員國亦如同其它開發中國家一樣，最擔心的是來自內部的威脅，各國執政者所關注的安全議題是內部的穩定、國家發展與社會和諧，也就是印尼與馬來西亞一直倡導與強調的「綜合性安全」，但是東協區域內國家具有多種族與多元文化的特色，其歷史衝突的經驗也多來自大國在此區域的權力與利益糾葛；<sup>2</sup>即使是近年來各國經濟發展漸漸稍具規模，但各國政治及經濟社會型態的不同，也一直拖延著東協區域經濟整合的時間表；這些問題在各強國勢力拉扯漸漸減弱，各會員國自主性愈來愈強的時代，卻提出「東協共同體」的概念，這用新現實主義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觀點是難以周延解釋的，尤其是峇里第二和諧宣言的提出，也並非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到底這種共同體概念是如何成形的，將成爲國際關係學者研究東協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社會建構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領域漸漸興盛，且建構主義針對人類意識中社群概念形成，也就是國家與國際社群的認同，有著廣泛與較深入的研究；此外建構主義針對國家與國際社會結構的形成與互動進行研究發現，此種出自概念的改變所引發的國際結構轉變，確實不同於新現實主義權力政治所能解釋的現實環境；而且建構主義對主流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權利分配與理性主義提出批判，也使得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紛紛開始檢討修正；在建構主義對各種傳統與修正理論的批判中，我們不能說建構主義以觀念爲主的利益觀具有比其他理論更強的解釋能力，但是，這樣的分析會爲我們研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提供新的視角；尤其是建構主義在國際結構建置分析上，大都採取「弱認知派」的主張<sup>3</sup>，這

---

<sup>2</sup> 劉復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念適用性檢討〉，《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2期，1999年2月，頁29-30。

<sup>3</sup>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rest,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0, Supplement 2 (Oct. 1996), pp. 177-228.

種論述是針對在國際政策協調上「認識社群」的角色以及政府一般學習條件與機制進行研究，而以作者立場觀之，此種論證正適用於東協組織架構演變情形之研究，因此作者以建構主義大師亞歷山大·溫特先生（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理論為主軸，並不否定現實主義重視的利益與權力的現實，但用較為樂觀的實證舉證方式，另從理念改變帶動權力與利益分配轉變的角度，來解析東協國家與國際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並對其提出發展「安全共同體」意涵進行研究，希能針對其安全機制組建與運作發展的相關議題獲致一些結論，並檢驗建構主義與主流學派看法的異同。

##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目的有二：

- （一）解構東南亞各國安全概念與東協安全機制演變。
- （二）透過建構主義的觀點，分析東協「安全共同體」整合之重要問題與可能發展。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歷史文獻分析為主，並輔以東協各國駐華人員之深度訪談，以檢證理論與實務結合情況。本論文將以歷史演進的垂直結構，結合文獻分析來演繹推展，並做宏觀的探討，試圖從歷史脈絡中，尋找因果關係變化的情況。此研究將以現實情況描述，從國家及區域兩個單元的不同角度切入，尋求完整客觀的實況，並採用亞歷山大·溫特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為分析基礎，以理論貫穿解釋國家及區域單元的反應，並與週邊國家對各重要問題的回應比對，以獲得實證性的結論。

本論文的研究途徑是針對建構主義理論核心部分中，有關集體身分與概念的轉變，促成對國際社會體系中他者的角色觀念改變，進而產生結構體系的改變，運用此種立論來檢證東協安全機制演變中的重要因素。

在文獻分析部分，係以官方與非官方文件資料蒐集為主，並以東協官方網站提供的正式相關文件為藍本，進行文件資料分析歸納重點，並參考相關學術論著比對評估實際可能之意涵，以免產生誤解；此外，並與各會員國之個別網站資料校補，以免產生遺漏或錯誤。本論文參考資料以中、英文論著為主，為免對東南亞十國之意見，因語言因素可能產生掛一漏萬的顧慮，故輔以深度訪談意見交換以驗證之。作者透過客觀觀察東協各國與區域組織的重要政策，大都屬於由上而下的指導議定模式，因此菁英份子的意見顯得極為重要，故此論文以東協駐華人員為訪談對象進行深度訪談，除因其多為各國菁英及具官方代表性外，一般駐外人員較具政治素養與觀察能力，對各國所處環境與國家政策的變化，應有較敏銳與深入的觀察，且因其為官方代表，對國家或組織的意見較能完整表達及論述；因此運用深度訪談，以擷取與談者個人與官方意見相互比對，以彌補對實況觀察與理論檢證的不足。本次接受訪談人員包括東協五國七位與談者（另有二位不願見諸文字），其專業分別包括經貿、法律、政治、軍事等多方面的管人員及眷屬（訪談紀要如附件）。綜觀東協中該五國與談者，對其專業事務非常深入，但並非每個人均了解東協組織與運作情況，然因其均為各國菁英份子，不論教育水準及工作經驗在各國均屬中上標準，因此談話中多鼓勵其發言抒發己見，均能獲得各員精闢見解，對本論文理論與現實的檢證，助益良多，且避免因個人知識的狹隘偏執所可能引發的謬誤。

##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等，並針對學術界研究東協區域安全與「共同體」發展之文獻，擇要探討國際關係主流學派---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並以建構主義觀點批判，以誘導出本論文採用建構主義觀點之討論。

第二章從建構主義理論源起與發展談起，並綜整建構主義各派系的核心論述，以及其對區域安全的主張，並在小結中依循核心論述導引出本論文探討面向。

第三章置重點於後冷戰東南亞權力互動與東協安全機制演變；由冷戰後國際情勢轉變，分析對當前東南亞權力互動影響的各項議題，並分別研究各大國如美國、歐盟、日本、印度與澳洲對東南亞的戰略目標調整及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此外也探索東協安全概念，並從東協安全概念轉變中了解安全機制建構的遞嬗。本章並未將中共戰略目標與安全機制角色列入，實因其為影響東南亞各項議題的最重要因素，故列專章討論。

第四章主為探討東協各國對中共威脅的概念轉變，由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鬥爭，到中美建交後各國紛紛與其握手但又擔心受怕，感覺中共永遠是一個最大惡鄰的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各開發國家均冷眼旁觀甚至落井下石，唯獨中共對東協各國示好，減弱及縮短衝擊的強度與時程，使東協從經濟衰退中迅速恢復過來，東協對中共的態度轉趨中立；2002年中共與東協簽訂安全合作協定，東協各國更轉視中共為機會，這些理念的轉變也增強東協對安全機制轉型的意願。

第五章將從共同體的概念與定義談起，除對東協「峇里第二和諧宣言」的內容與意涵深入剖析，並對東協意欲建構三個共同體的方向，作歷史回顧與前瞻規劃的分析，以了解東協擴展區域安全需求及建構「安全共同體」的期許。

第六章為本論文重點，係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將東協面對更為嚴謹的區域安全機制—「安全共同體」時，其內部各國的社會集體認同、安全兩難與相關規範、規則的構建與實踐等問題，逐一討論；此外，也就當前國際關係發展現況與趨勢對東協共同體組建與運作影響，進行研究，期能更明確指出東協未來轉型時面對之問題癥結，並提出可能發展方向的研析意見。

第七章為本論文之結論，將區分理論反省、研究發現及評估與展望。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東協因應區域安全情勢的轉變，企圖仿效歐盟建構三個支柱，使成爲將來區域整合的基石，但歐盟的區域整合其演變過程歷時甚久，且歐洲各國之歷史文化雖有所不同，歐洲的整合一直都在美、英、德、法等大國的鼎力支持與參與下，才能逐次完成至現今的地步；反觀東南亞各國在歷史文化上與歐盟有著顯著的差異，雖然成立了東協的區域組織，但是卻一直拘泥於所謂「東協之道」（ASEAN way）的窠臼中；而且逐次演變成立相關的安全合作機制，都僅止於研究、對話與議題研討層次，而缺乏信心的建立，對區域安全維護並無實質上的執行力與拘束力。本論文從建構主義觀點出發看東協「共同體」的建構，雖然共同體內容包含經濟文化與安全三各層面，但本論文偏重於東協面對這種國際安全環境的變遷，其安全概念的轉變與尋求安全機制轉型的行動；而因爲有了新的覺醒與需求，東協提出的在 2020 年前，將區域整合成「安全共同體」的宣言，其中還存有許多疑意向待釐清與解決，故本文尋求這些問題的癥結，並進一步研究及尋求可能發展方向。

#### 二、研究限制

##### （一）研究範圍的限制

本論文的主題爲一動態現實，牽涉層面甚廣，尤其是多邊國家的任何互動都將影響區域整合，因此在撰寫時將儘可能的將論文內容限制在安全議題上，並輔以重要的相關政經關係及影響之研究，以充分說明實際景況及可能發展。此外，東協目前的規劃建構方向，也將隨國際情勢發展有所修正，本文以 2003 年東協「峇里第二和諧宣言」爲基礎，探究東協區域安全整合轉型的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獲致來自國際支援的各種機遇。目前東協官方僅有一紙宣言，雖有所謂東協方式「一致決」的基礎，但是並未有進一步的規劃內容公佈；因此本論文將受限於此，但仍將以東協官方之相關文獻，以及東南亞各國學術研究資料爲主，並輔以東協多國駐台人員的深度訪談，雖爲少數人意見，但各國駐外人員多爲各國精英，對其國家政策的了解，應具有代表性，另配合學理探討及現況發展與趨勢研判，將會使本論文的研析更趨合理。

##### （二）研究取材的限制

本研究論文研究取材的參考資料力求周延，因此大量運用東

協各國與美中台之相關論著，交叉比對，並運用分析比較方法，尋求最完整之論述據以研究未來區域安全機制走向；然因此議題尚屬初議，官方資料與組織正式規劃框架並未確立，故本論文考據東協運作之歷史例證與現行作法，以及學者針對本議題的論述為基礎進行推論，並採用各國人員深度訪談之資料客觀分析，以免因僅採用東協官方宣傳資料或簽署文件，使推論過於理想而脫離現實框架導入錯誤之研究結果。

此外各國外交決策過程與東協組織對「共同體」的規劃，是極其機密的，尤其對東協各國高峰會決議事項，多牽涉各國利益與安全，除無法對未來組織結構的功能、決策的過程不易掌握與了解外，各國對此議題的發言，亦甚多是對本國有利的宣傳話語，在學術研究時應加以區分真偽或可信度深淺，以免誤植資料，影響研究結論之價值。

#### 第四節 文獻探討

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國際安全常是重要的研究項目，但仔細審思何謂國際安全？相信其中討論絕大部分是以國家安全為中心，再者即為國家間互動產生的影響；因此現實主義學者非常喜歡運用安全議題，來解釋國際關係中的國家利益，更常將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畫上等號，而這種安全觀，在過去的研究中，幾乎已成為主流觀點，不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體系與制度安排息息相關，就連整個聯合國運作中所主張的反侵略與自決理念，都是以國家主權觀念出發，而這種狹隘的安全觀卻也主導了國際社會約三十年。<sup>4</sup> 例如費爾曼先生（Lawrence Freeman）在“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一文中提到，現實主義定義和平與安全，只是軍事武力的部署與遏止而已，<sup>5</sup> 而這些武力的展示，代表的是國家的權力，有足夠的權力才能提供國家在國際間足夠的勢力，也隨之能夠確保國家的安全；但權力只是尋求國家安全中一種可能使用的手段而已，擁有的權力大小，並不代表國家安全被確保的程度高低，因國家力量軟弱會招致攻擊，但是過強的權力會對其他國家形成刺激，使其他國家增加聯合對抗的意圖，反而不能確保國家安全；因此過分強調軍事權力，是現實主義解釋國際關係時的迷失，因為，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尋求自助，擁有軍事權力只是一種手段，國家真正關切的是安全，而達到安全的手段絕不只此而已。也因此新現實主義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間衝突內容與方式改變，多種面向的威脅注入安全議題的範圍，學者們也重新審視加入環境惡化、人權、以及貧窮、不均等議題，尤其是區域整合的趨勢與全球化的影響因素，更成為安全研究的重要面向。<sup>6</sup>

密傳尼先生在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一書中，採用功能主義來解釋國際社會間互動發展與區域安全整合，他提出國家間互動，會降低民族主義的激情，甚至轉移此情至國際社會的合作，也就是區域整合，利用製造出來的國家間互賴，進而跨越國界的障礙，尋求國際組織利益，而國家也因捨得拋棄一些國家主權，而能分享團體的利益。<sup>7</sup> 此外哈斯先生在The Uniting of Europe一書中以歐洲煤鋼共同體為例，來解釋區域整合的進程；他提到歐洲煤鋼共

---

<sup>4</sup> James Busumtwi-Sam,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LVII, No.2, 2002, p.255.

<sup>5</sup> Lawrence Freem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 Targets,” *Foreign Policy*, Issue 110, ( Spring 1998 ), p48-62.

<sup>6</sup> Bryan Mabee,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Security St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2,2003, p.135.

<sup>7</sup> David Mitrany, *The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s*,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75 ), p.x.



同體發起之初，並未獲得西歐大多數菁英份子的支持，但是運作數年後，此組織使各國獲致實際成效，開始轉變各國政黨菁英、勞資領袖的態度；哈斯認為這種從國際組織合作獲致利益來轉化概念，也就是所謂「溢出」(spill-over)的效果，並非全部階層獲益，但是菁英份子得利，產生對區域整合的支持，進而擴大到其他部門與領域的合作，已足夠達到區域整合的目的。<sup>8</sup>

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是以菁英份子在整合中獲益為基礎，進而促使區域整合內容及範圍的擴張，來達到區域整合的目標；但他們的研究對東南亞的區域整合來說，是有缺陷且無法全面解釋的；例如密傳尼認為的國家互動產生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會，並經由放棄部分國家主權，來獲致國際組織團體的利益與其他國家分享；但是東南亞國家自 1961 年開始，就有「馬來聯邦」、「東南亞協會」的區域組織，但是這兩次整合嘗試，均在極短時間就宣告失敗，雖然原因可能為這兩案例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泰國與菲律賓，各國並未具備足夠的內政穩定與經濟基礎，即使各國卻確有菁英份子從中獲利，但仍不敵未獲分配利益者與多數國民的反制，使區域整合的效果無法彰顯，而宣告失敗；但作者認為當時各國人民對區域組織的功能並不信任，人民及執政者只見他國的威脅，無法看見組織對安全的保障，缺乏群體認同會強化區域及國家安全的概念，且區域組織在機制運作中，無法獲得各國充分支持，顯見在區域整合中，各參與國的大多數人民具備群體認同的意願與共識，是推展區域整合組織的重要因素。

另丁銘泉的論文「現實主義下的東南亞區域安全」，是以現實主義出發，探討東南亞國家與區域組織的角色利益，他認為用現實主義來解釋，「一個國家的利益與主權是無法妥協的，如果妥協，就象徵利益與主權的喪失，國家的價值就不復存在」，<sup>9</sup>此種觀點已經不能解釋國家間合作與互賴的關係，雖然他提出互賴理論來解釋國家間的合作是互利的，但是他的基礎論點，仍認為國家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如果沒有利益可圖，國家間互賴關係將容易瓦解。這種論述，就建構主義的觀點而言，國家間互動會改變利益的內容，而且國家在區域結構體系中，最終將是尋求國家的絕對利益，單一的物質利益或許是被考量的因素之一，但是區域整體環境，以及國家間的互動對體系結構的影響，亦將改變彼此的身分與利益，

---

<sup>8</sup>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6.

<sup>9</sup> 丁銘泉，《現實主義下的東南亞區域安全》，國立中山大學碩士研究論文，1995年7月。

即使是相對利益縮小，但絕對利益增大，國家間的關係亦能維持，甚至變得更緊密，主要是因為國家間對彼此的角色認知已改變，國家已不是敵對關係，區域中國家已發展成相互競爭的互利關係，甚至是利他的朋友關係；因此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建構，並不能單純的用現實主義所談的國家利益來衡量。

博特先生（Wayne Bert）在其“*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A Changing of the Guard?*”一書中強調，越戰後美國勢力逐漸撤出東南亞，冷戰結束美國在此區域的勢力就更顯薄弱，除了經濟投資外，軍事投資已不復見。但是，中共勢力的崛起，以及與東協關係的改善，促使美國又開始積極介入東南亞各項安全議題；但是，博特認為，美國採取的仍是孤立中共的戰略，仍視中共為敵人，並未改變中共在東亞區域角色的認知，而此種做法，是不務實的，且未考量東南亞各國家的親身感受，更會使得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喪失，甚至將其完全轉移至中共身上。博特對美國強硬派採取現實主義的做法提出批評，並建議美國政策應考量美國國家的絕對利益。其實這就是一種建構主義的觀點，只是博特並未對此種觀念的轉變進行討論；本論文將就東協的觀點出發，研究東協對內部及國際環境概念的轉變，其對東協安全機制演變的影響進行研究。

東協各國所面對的內政問題及經濟水平不一，當然容易造成區域組織的分分合合，但是正如中國大陸學者翟坤與余翔在對東協合作機制研究中發現，東協區域組織的分合與轉變，國家利益並非惟一考量因素，而大都是因為各國互動中產生概念的轉變，導致組織機制的改變，甚至東協各國最堅持的「東協方式」（ASEAN way），在1999年11月的東協高峰會中，經泰國前總理利川提出：「為使東協能即時處理緊急且重要區域性政治與安全問題，以及可能擾亂地區和平與和諧的共同情況」的提議中，各國同意授權前、中、現任的輪值外交部長組成小組，實施緊急處份權，而此種授權已突破了東協各國堅持的原則，顯示此項堅持是會妥協及改變的<sup>10</sup>；在東協的第二和諧宣言中，雖然，各國仍堅持不干涉、共識決的原則不容違背，但是，從上述泰國前總理的建議中可知，東協國家將會面臨更多共同且必須儘速處理的議題，而這些問題亦將影響各國與區域的安全利益與發展，而這些問題會否使「東協方式」漸漸鬆動，而使東協各國開始面對更緊密結合的運作機制，此問題亦將在本文中探討。

---

<sup>10</sup> 翟坤、余翔，〈從東盟年會看東盟合作機制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0年，第9期，頁29-30。